

唐两京与文学创作的 文化学考察

洪迎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两京与文学创作的
文化学考察

洪迎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两京与文学创作的文化学考察 / 洪迎华著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203-0040-7

I . ①唐… II . ①洪… III .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唐代 IV . ① I2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33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

插 页 2

字 数 379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唐两京的历史变迁与文学	18
第一节 唐都长安的建设及盛衰变化	18
第二节 唐代洛阳的建设和地位变迁	30
第三节 唐代洛阳的历史变迁与文学	54
第二章 唐两京与京都文学	69
第一节 初唐诗坛京都诗	69
第二节 唐代京城早朝与诗歌	89
第三节 唐代京城寓直与诗歌	103
第三章 唐两京唱和与文学	120
第一节 唐代两京唱和文集考述	120
第二节 唐代京城与君臣之间的应制唱和	131
第三节 唐代京城与京官的同朝唱和	149
第四章 唐两京游谒与文学	171
第一节 唐代士人的游谒活动：游学和游宦	171
第二节 唐代士人的京城干谒行为	187

第三节	干谒与京城躁进趋利之士风	193
第四节	京城名利场与士人干谒的辛酸炎凉	200
第五章	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217
第六章	唐两京与贬地诗歌传播的差异考察	236
第七章	唐代东都分司官与文学	251
第一节	唐代东都分司官的闲散性质	251
第二节	唐代东都分司文人的数据统计和分析	259
第三节	唐代东都分司文人的任职心态	283
第四节	唐代东都分司文人的诗歌创作	297
第八章	唐诗中的两京表述和文化差异	343
第一节	唐诗中的《长安道》和《洛阳道》	343
第二节	唐诗中的“灞桥”与“津桥”	360
第三节	唐两京与晚唐咏史怀古诗	376
主要参考文献		389

绪 论

京都，中央政府所在地，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唐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云：“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①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京都有所谓的“三皇五帝之都”。如宋代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和郑樵《通志·都邑略》皆有此方面的梳理和记录。“京都”和“京师”正式称谓的出现则最早见于西周时期，如《诗经·大雅·公刘》云：“京师之野，于时处处。”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亦载：“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②追溯京都的起源，其形成与建立之始即因政治因素的制动和主导。历史典籍上的记载或以“宗庙之置”言之，如《墨子·明鬼篇下》有：“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③《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也记有：“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④或者以“天子之居”来表征，如汉刘熙《释名》卷二曰：“国城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⑤《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亦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⑥无论“宗庙”，抑或“天子”，皆是古代朝廷和国家政权的代称。

①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页。

② （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四部丛刊景元大德覆宋监本。

③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5页。

④ 蒋冀骋点校：《左传》卷三，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8页。

⑤ （汉）刘熙：《释名》，四部丛刊景明翻宋书棚本。

⑥ （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中国历史上的京都涵括了浓厚的政治语义色彩,但仍必须建立在某个具体的地域范围内,承载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之上,所以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地域概念。《周礼》曰:“距国五百里为都。”^①《白虎通德论》卷三亦云:“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皆描述了古代京都的空间规模和辐射地带。所以京都与文学的研究,仍属于地域与文学的研究范畴。

一 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

时间和空间是人物活动及历史演进的二维基本要素,对文学活动和文学发展来说亦复如此。这就要求我们解读和研究古代文学时,既要有时间的和“史”的维度,也要有空间的和“地”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我们理解一篇文学作品或者一个文学活动时,不仅要弄清楚它发生于何时、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还要了解它出现于何地、追究它的空间背景,二者缺一不可。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文学学术史上,从地域的角度来关注和考量文学家和文学创作,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代不绝响。如文学史上两部最早的文学集子《诗经》和《楚辞》的编撰,就已明显体现出地方和地域的眼光与特色。所以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中讲道:“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诗经》主要是北方文学;《楚辞》则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营养。《诗经》的质朴淳厚,《楚辞》的浪漫热烈,体现着北方和南方两地的差异。”^②后来散见于各时期史料记载中的地方文人群和地域文学流派,前者如“吴中四士”、“永嘉四灵”、“闽中十才子”、“金陵四杰”、“娄东三凤”等,后者如江西诗派、岭南诗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或者是历朝文人编撰的地方诗文集和地域诗话,前者如《丹阳集》、《会稽掇英总集》、《河汾诸老诗集》等,后者如《全闽诗话》、《全浙诗话》、《榕城诗话》等,都带有明确的地域考量和研究意识,是地域文学的典型范例。还有历史上对自晋以后日益凸显的家族文学活动的记载和关注,因“家族复限于地域”,也与文学的地

①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域研究紧密相关。较早的如“东海三何”，《梁书·何思澄传》载：“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郟人。……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①之后又如明人胡应麟对唐代家族文学的评论：“唐诗赋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学并称者甚众，而不能如汉、魏之烜赫。至祖孙相望，则襄阳之杜，亦今古所无也。”“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奕天下，而崔尤著。……（崔之显著，大率清河、博陵，自余不过十三耳。）”^②凡此种种，虽分散零乱、不成系统，但已充分显示了在地域与文学的关注上，我们已有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学术史料。

文学的地域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开展文学的地理学研究，考察一定地域空间内的人文地理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从而掌握历史上文学的地域分布、地域差异和变迁。在这一方面，前人的论述亦精彩纷呈。比如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之助益的，最典型者莫过于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的“江山之助”：“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③从人文环境、地理风俗来讨论文学的，著名的如《汉书·地理志》中对“风”“俗”的定义及对《诗经·国风》内容风格的阐释。还有的关注到了地理环境的变迁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如《唐才子传》中谓张说谪刺岳州之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④。又如宋葛胜仲《中散兄诗集序》所评：“先生所长不特诗而已。昔司马迁历游郡邑。故文增秀杰之气。张燕公得江山之助，故诗极凄婉之美。先生以使事行天下，几半名山峻壑瑰伟卓绝之观，无所不历，今其诗粹清而气壮，平淡而趣深，亦岂胜游之助耶！”^⑤这些见解和观念，至今为学人所承袭，对我们的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

① 《梁书》卷五〇《文学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3页。

②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74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5页。

④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张说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⑤ （宋）葛胜仲：《丹阳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在学术史上,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开始走向自觉,并形成气候和体系,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国门开启,西学东渐,思想活跃。在学术界除了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外,因西方社会学中地理学的影响,文化与地理、文学与地理的研究亦成为一时所趋和热门的话题,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在这些论述中,古典文学在地域上的南北划分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研究模式,如刘师培一文勾勒了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南北文学的不同特点,王国维从南方学派和北方学派的思想论述“吾国之文学”,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亦论及文学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之后的三四十年代,此方面的研究仍然得以传承。代表者如陈寅恪在文化地理上的相关著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同时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亦指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②还出现了一部专门的地域文学史,即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可以说,在20世纪上半叶,文学的地域研究在整个学科体系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在20世纪后来颇为热闹的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地域性因素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关注。正是针对这一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有学人提出研究上的偏向和问题,并对文学的地域研究予以倡导和设想,如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云: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87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页。

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研究。^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云：

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②

李浩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也指出：

以往的研究重视时（时间）而忽略地（空间）。唐代文学是历史时期的文学，文学演进过程中先后有许多重大事件依次展开，许多重要人物相继登场亮相，故对时间的强调无疑是必要的。但历史同时又是在一定空间中展开的，空间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演出的舞台，有了地理空间，人物与事件就能立体地突显、具体地活动。文学研究如果只考虑时间元素（时代性）而忽略空间元素（地域性），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解释。^③

这些看法皆切中时弊，指出长期以来我们文学研究中重时间而轻空间、重历史而轻地理的明显偏向。卡西尔《人论》云：“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框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人和真实的事物。”^④文学，作为人的创造物，和一切实在的人与事物一样，同样离不

① 《读书》1986年第4期。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46页。

③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页。

④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开时间和空间这两种框架和条件。文学史的书写，也只有做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融并重，才能对历史上的文学活动和真实图景完整再现。所以文学研究中空间条件的缺失，其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文学发展的认知是片面的、平面的，而不是全面的、立体的。相应地也造成了，“目前文学史的书写，只有时间的序列性，而没有空间的序列性。我们比较清楚每个时代文学史的历时性变化，但我们不太清楚每个时期文学史共时性的空间分布与变化”^①。

即使学界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在整体成就上远远不如文学史的研究，但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中国文学研究模式的解放和多元，与学界对以往学术研究的反思和拓进，从地域和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逐渐吸引了学人的眼球，相关论著陆续出现，不断增多，并在近二十年内日渐兴盛，成为一个大有可为的学术生长点。不仅有一系列的单篇论文聚焦于作品作家的地域性特点，如章培恒的《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异》、曹道衡的《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唐圭璋的《宋代词人占籍考》、王水照的《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等，还先后出现了一些力图在文学地理的研究上建构学科体系的论著，早期如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按各代行政地域分布对文学家予以统计分析，探讨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的格局、特点、成因和规律，进而观察中国古代文坛在空间上的发展变化。又如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其中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认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有着广泛而又复杂的研究内容：诸如文学发达程度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各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都属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基本内涵。”^② 21 世纪后，文学地理学的理

① 王兆鹏：《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文学遗产》2012 年第 2 期。

②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4 页。

论研究和体系建构更显抬头之势，如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提出：“值得关注的是，把地图这个概念引入文学史的写作，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价值。它以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因为过去的文学史结构，过于偏重时间维度，相当程度上忽视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这样或那样地造成文学研究的知识根系的萎缩。地图概念的引入，使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和文学史的领土，进行重新丈量、发现、定位和描绘，从而极大地丰富可开发的文学文化知识资源的总储量。”并认为文学地理学应关注四大问题，即地域文化的问题，对作家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的关注，大家族的迁移和文化中心的转移问题。^①另如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理论支撑，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这些成果或高屋建瓴，或有实证、系统性的考察，所提出的构想和观念对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相关的成果又如周晓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等，2011年，学界还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标志着文学的地域研究已经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被认同和重视，亦预示了这方面研究在未来的蓬勃开展之势。

二 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日渐兴盛的大背景下，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亦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所见文章如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见其著《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戴伟华的《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

^① 《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1999年第1期),专著如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等,均具有学术深度和开创性。此外,还有一些散见的论文讨论某个地域空间和具体作家的创作关系。纵观近代以来学界对于唐代文学与地域关系的探讨,集中表现出以下研究格局。

一、立足于文献史料,爬梳唐代文人的地域分布和构成,从而考察文人创作的地缘因素,及唐代文学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心和格局。

这主要表现在文史研究学者对唐代文人籍贯的重视和清理。系统考察成果如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隋唐五代部分)、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见其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实证的方法为唐代文学的地域考量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具体的数据。另外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之“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余恕诚的《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等论著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对唐代文人的籍贯情况进行了梳理,从而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如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一文,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对唐代存诗一卷以上的233家诗人的籍贯进行统计,最后认为:“就唐诗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跟地域因素的横向联系去寻索,前三个阶段,无论从诗歌创作的主体(作者)还是客体(描写对象)看,创作主要基地都在北方,而晚唐则更多受南方风土人情影响。”“唐诗最后阶段正是随着创作方面南方因素的增长,气质发生了由刚向柔的转化。”^①

二、从唐代文人的空间活动和聚集状态,考察地理人文环境的变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及文学群体和文学中心的构成。

相对文人的出生地和占籍分布来说,这是一种动态地空间考察。一

^① 《安徽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者,文人因漫游、贬谪、迁徙等行为造成的地域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这是历来研究者的共识,这方面的论著亦较多,如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文学》、余恕诚的《李白与长江》(《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贺秀明的《刘禹锡与巴山楚水》(《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许总的《文化与心理坐标上的王维诗》(《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2期)等,皆是着眼于“地”的因素,从自然和人文地理的角度来探讨诗人创作内容及风格的优秀成果。二者,以地域或人物为向心而造成的文人流动和聚合,造成了相应时期文学在空间分布和创作风格上的变化。而且,相较以籍贯为视点的文学空间的静态分布来说,这种动态的分布更能反映唐代文学的时代风貌和创作实际,因而受到学人的关注。如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方镇为单位对其方镇幕僚作了全面梳理,因方镇以一定区域为其活动范围,故方镇幕僚的生活行为和创作活动也被相对地限制在一定的区域中,他们的文学创作势必带有地域文化特点。又如贾晋华的《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考察了太宗宫廷诗人群、中宗文馆学士群、大历浙东浙西诗人群、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大中襄阳诗人群、晚唐苏州诗人群等,实际已从地域的角度勾勒出了唐代诗歌在空间上的格局变动史。另如胡可先的《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素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诗坛中心的研究,以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区域诗歌发展的研究和特殊区域的诗歌发展研究,亦是从文学人物的流动和汇集出发,观察唐诗的空间分布与变化。

三、宏观探讨区域文化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在区域文化的划分上,受南北朝文化研究的影响和制约,或侧重于南北比较,或持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学说。

中国文学的南北差异,在《诗经》、《楚辞》的时代就已显露,并在学术史上受到长期和普遍的关注。隋唐王朝在历史上紧随南北朝的长期对峙之后,从唐初开始,学者对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南北差异就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魏徵在《隋书·文学列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

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①唐朝一统江山之后，在文风上积极提倡南北融合，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以实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文学理想。而且，在后来的唐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南北文学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正如程千帆先生在《文论十笺》中所指出的：“抑犹有进者，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②故而诗至盛唐，声律风骨兼备。但是，山川物理、人文积淀而形成的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和融化。所以在学术史上，甚至时至当今的唐代文学研究中，这种南北区域的文化分野仍成为一种常见的认识模式。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对唐代文学的论述：“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常、崔、李，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孟、贾、卢，思苦语奇，缜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温、李之诗，缘情托兴，谊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③又如袁行霈在《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所云：“唐朝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在唐代，也仍然不乏具有地域色彩的作品。如岑参的边塞诗以西北边塞的自然风光为背景，展示了军旅生活的各个侧面，以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吸引广大的读者。而词，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裁，也带有相当明显的地域色彩。中唐时期第一批学习民间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南方的情调。”^④又如景遐东的《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亦是在南北文化的粗略划分下对江南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学进行的专

① 《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② 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③ 转引自程千帆《文论十笺》，第108—109页。

④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33、37页。

题研究。

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学说，则是受陈寅恪对隋唐制度三大渊源的论述之影响，中云：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于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属于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①

所谓（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周这“三源”，即指山东、江左、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4页。

关中三大地域，这三大地域概念在《隋书》、《北史》、《唐书》中早有提出，但陈寅恪首次从江左、山东、关陇三大地域文化入手，对隋唐制度的文化渊源进行了切实的梳理和辨析，故而后来学者在唐代地域文化的认识和分区上多受其左右，并从这三大文化版块来研究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如杜晓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尚定的《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即皆是以此为研究思路。

三 唐“两京”与文学的研究

关注古代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域空间就是中国的古都。王国维曾言：“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①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而在中国的六大古都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之中，长安和洛阳作为中国古代建都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又曾在汉代因迁都问题引起高下优劣的争议，故而最受学界关注。如在历史学的古都研究中，就以长安和洛阳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相应地，以长安和洛阳为赋写对象的“京都赋”在文学研究中也一直颇受重视。

长安和洛阳的建都历史虽可溯自周朝，但在文学史上以“两京”之名昭著，则始自东汉班固《两都赋》及张衡《二京赋》的创作问世之后。降至唐朝，李氏以长安为首都和政治中心，同时沿袭古制又设有陪都。在唐代历史上，陪都的设置情况较为繁杂，除了洛阳以外，并州、太原、成都、荆州都曾一度作为陪都，而且增设废省，因时而异，先后有两次五都并存的情况。但洛阳作为唐朝陪都的性质，从唐太宗伊始，一直到唐末基本未有改变。长安和洛阳在唐代不仅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这在唐代诗歌的表述中比比皆是，如李端《送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一〇，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